

# 夏商周时期考古

王立新 李 朵

2015年夏商周时期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成果颇丰，发表简报、报告和研究论文总计300余篇，出版田野考古报告、专著、论文集和图录等70余部，召开了“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河济地区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学术研讨会”“夏商周时期的中原与周边——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暨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纪南城考古发掘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湖南出土商、西周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

## 一 夏代

2015年度有关早期夏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东赵遗址发现的新砦期城址，不仅证明郑州地区存在新砦期遗存，而且凸显了该地在夏代早期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对于进一步了解新砦期遗存的分布、文化面貌、性质归属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物报》2月27日）。

袁广阔再次强调，对于早期夏文化的探索，不应忽视河济地区的后冈二期文化遗存。他认为，该类遗存在年代、地域、文化面貌、聚落特征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夏后氏的早期活动密切相关，我国首个早期国家实应兴起于河济地区（《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2辑）。张雪莲、赵春青对新砦遗址2002年发掘出土动物骨骼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遗址不同种类家畜之间的饲养方式虽有所不同，但家畜的食物均是以包括粟、黍在内的C4类植物为主（《南方文物》4期）。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及研究仍持续受到学界关注。

2015年度报道有二里头遗址2012~2013年度的部分发掘收获，包括宫殿区内东北部的一处巨型坑（《考古》12期），以及围垣作坊区的一条南北向夯土城垣（Q7）和两侧的路土遗迹（《考古》1期）。郑州东赵遗址除发现新砦期城址外，还确定了一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重要城址——中城（《中国文物报》2月27日）。

许宏总结了二里头遗址的工作历程和发掘收获，重申该遗址是到2015年可以确定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年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性遗址，其宫室建筑的空间规划和都邑的总体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中原文化研究》4期）。许宏同时又力主，就目前最新的测年结果等因素来看，二里头遗址为早商都邑仍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假说；甚至二里头遗址性质的最终确定，也需要相关文字材料的证明（《南方文物》3期、《中国文物报》11月6日、11月20日）。不过，也有学者对不断下拉和压缩的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产生了疑惑。魏凯指出，二里头文化测年数据与考古分期方案及天文学推算成果之间存在

在诸多矛盾，原因或许在于<sup>14</sup>C测年技术自身的局限。他主张，当前的<sup>14</sup>C测年数据只宜作为二里头文化定性研究的参考；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构建尚需通过多元证据的互校和整合来实现和完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

钱燕分析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文化因素、分布地域以及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的关系，认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遗存仍属于夏文化，属夏文化晚期阶段。张继华对登封南洼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析，认为该遗址第三期遗存的存在，表明二里头文化前后两大期之间是渐变和连续演进的；二里头文化分期方案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此外他还指出，南洼遗址发现的环境证明，二里头文化腹心地区的聚落也存在大规模的防御设施（《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2辑）。

可喜的是，在上述基础问题研究之外，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二里头文化时期早期国家政体的出现、军事防御体系、都邑内人群构成，以及中心与边缘的互动等问题。

曹兵武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出现，结束了早期中国不同区域文化传统间的自然生长和竞争的模式；以距今4000年左右的降温事件为背景，中原地区发生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导性的文化整合与重构，形成了整个东亚文化相互作用圈中“共识的中国”（《中国文物报》9月11日、9月18日）。这之前王巍等人的看法有相似之处。李昶、张书峰通过考察新砦城址、二里头遗址等多处夏代重要遗址的材料，将夏都军事防御体系划分为都城地区和外围地区两重层次，并认为夏代早期是以都城地区为重点构建防御体系，而中晚期则以外围地区为重点构建防御体系（《中原文物》3期）。赵春燕依据人牙釉质锶同位素比值的测定，对陶寺与二里头遗址人口迁移现象和迁移规模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二里头遗址应是本地人口占居多数，但也存在较高比例的外来移民（《中华之源》）。张国硕结合文献与考古材料，考证夏代韦、顾、昆吾三方国的地望可能分别在今郑州市区、荥阳大师姑和新郑望京楼等地（王震中、高大伦、肖先进主编《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中国广汉）》，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方国文明》）。

邓聪、王方通过观察出土牙璋的细部特征，发现二里头 VM3:4 牙璋的制作工艺与风格，对包括成都金沙在内的西南地区的同类器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也波及东南沿海地区。他们认为，牙璋跨区域的复制可视为政治权力观念由原生国家向次生国家传播的一种表现；牙璋等实物资料的存在，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夏王朝政治理念的实践，代表着东亚广域王权国家的起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

高寒考察了二里头文化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方国文明》）。辛爱罡对二里头文化非镶嵌类绿松石制品的使用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均作为服饰之用，按功能划分主要有耳饰、项饰、腕饰、冠饰等。此类饰品在二里头文化一期已出现，二期之后渐趋繁荣，均出土于贵族成人墓葬之中（《中原文物》6期）。

四坝文化、齐家文化仍是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重点。

以往多次调查表明，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是一处与早期冶铜业相关的重要聚落遗址（《考古与文物》2期）。2010年对该遗址的发掘，获得马厂晚期至四坝早期和四坝文化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为探讨四坝文化的来源、河西走廊早期冶金技术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材料（《考古》10期）。

张良仁、王辉将西城驿遗址出土的彩陶划分为三期，认为三期彩陶各具特征又呈现出前后延续的特点。第一期为马厂晚期，第三期属于四坝文化，第二期相当于以往所说的“过渡类型”，但与第三期特征更为接近，故可归入四坝文化（《北方民族考古》



2 辑)。陈国科等人对西城驿遗址 2010 ~ 2011 年发掘所获金属遗物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该遗址的冶金技术处于由红铜—砷铜合金阶段向锡青铜阶段的过渡时期(《考古与文物》2 期)。李延祥等人对西城驿遗址出土的炉渣、矿石、炉壁附渣等冶铸遗物进行了系统检测,初步判断至少在二期中段该遗址已掌握了冶炼青铜合金的技术(《考古与文物》2 期)。张雪莲等人则对西城驿遗址出土人骨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当地先民是以 C4 类植物为主食,并且地层堆积偏下的人骨显示出了更高的肉食程度(《考古》7 期)。

青海喇家遗址 2014 年发掘获得丰富的齐家文化遗存,其中陶窑和三座房址共用一处门前场地等现象是该遗址的首次发现(《中国文物报》3 月 13 日)。

“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的组织和召开,将齐家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张天恩对齐家文化的分期、年代、发展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他认为,该文化可分为四期,年代在公元前 2200 ~ 前 1400 年。同时,该文化有自西向东发展的态势,尤其是在第一、二期有较大范围的扩展,影响范围可及中原腹地。朱乃诚对齐家文化玉器中具有中原文化传统的器类进行了研究,并对此类玉器所反映的中原与陇西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历史背景展开了讨论。叶茂林论述了齐家文化的材料对于研究当时甘青地区气候环境、生业形态、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现实意义。赵春燕等人对喇家遗址出土动物牙釉质进行了锶同位素比值分析,发现喇家早期动物资源的获取以自给自足为主,晚期才有外来资源的补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8 期)。

辽宁锦州西大砬子遗址 2012 年的发掘(《北方民族考古》2 辑)、赤峰松山区水地乡大南沟石城的调查(《草原文物》1 期),均报道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刘潼、温科学探讨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几处重要聚落遗址的生业形态、仪式活动、聚落结构及其反映的社会发展程度等问题(《北方民族考古》2 辑)。朱乃诚、黄可佳考察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朱乃诚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传统承自红山文化,并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多方面玉文化因素,形成了独特的玉文化面貌,最终对商周玉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新世纪(续)》)。黄可佳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用玉观念相较红山文化有明显转变,由对神祇的崇拜转变为对玉石钺所代表的权力象征的重视(《草原文物》2 期)。

2015 年度关于先商文化的研究不多。高天麟对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出土陶器进行了分期和文化因素分析,认为该墓地陶器群所呈现的复杂文化面貌,与王国维关于夏人与“商人错处河济盖百岁”的见解相符(《新世纪(续)》)。侯亮亮、徐海峰对河北赞皇南马遗址出土先商文化动物骨骼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先商文化的家畜饲养方式(《边疆考古研究》17 辑)。

此外,江苏泗洪后陈遗址发掘的岳石文化遗存得以报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7 期)。彭博尝试复原了朱开沟遗址早期青铜时代房址的结构和建造过程,并据建筑工序和功能区别,将房址分为手工业制作、集会或宗教功能的公用建筑和日常起居的私人建筑两类(《北方文物》4 期)。

## 二 商代

商前期考古仍主要围绕一些都邑性聚落而展开。偃师商城三号宫殿基址（《考古》12期）、新郑望京楼城址内发掘的一批小型房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和郑州东赵遗址商代早期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2月27日）有简要报道。

该领域研究内容多涉及聚落及各类遗存现象的解释。

谢肃分析了郑州商城的兴衰过程与历史地位，认为该城中心聚落的地位仅在白家庄期为小双桥遗址所短暂取代；白家庄期以后，伴随小双桥遗址的衰落，郑州商城又重新成为郑州地区的中心聚落，一直持续到人民公园期（《中原文化研究》2期）。张立东研究认为，郑州商城的内城应是南北各一门、东西各两门的六门三街式格局，与偃师商城最初格局一致（《江汉考古》4期）。庞小霞、高江涛推测郑州商城 C8T166M6 墓主生前为武官，因在夏商之争中立有特殊战功而被葬入王室宫殿区（《中原文物》6期）。冉宏林指出郑州商城的各类手工业作坊均存在手工业者居葬同地的现象，并以“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来解释这类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2辑）。

张国硕发现，洹北商城是以城郭布局来规划设计的，具体的建造经历了从“宫城与环壕”到“宫城与大城”的发展演变，但是大城城垣未及建成即遭废弃（《考古与文物》4期）。陆忠发认为洹北商城的所谓“宫城”其实无“廷”，故并非宫城，而应是军营（《殷都学刊》1期）。赵俊杰则指出陆忠发所持“军营说”的论据不足（《殷都学刊》4期）。通过与岐山凤雏西周宗庙基址的对比，王恩田认为洹北商城宫城内的两处建筑基址应是宗庙而非宫殿，其中一号基址祭祀的神主可能是武丁卜辞中的“九示”，二号基址祭祀的神主应是武丁的“四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

张科分别将盘龙城和荆南寺遗址出土陶鬲与中原腹地同类器进行了相似度的比较，据此推测盘龙城遗址的商人可能源于辉卫型和二里岗类型，其后与土著居民处于高度融合状态，而荆南寺遗址的商人很可能是二里岗类型人群的一支，与商文化中心区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相对独立于当地土著之外（《江汉考古》1期）。此说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探索。郭明考察了盘龙城商代大型建筑的特征，指出其与同期中原商文化大型建筑的主要特征相同，但也存在细节上的差异，或与地域特殊性相关（《江汉考古》5期）。

朱剑等人采用 INAA 方法，检测比对了小双桥和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样本，结果显示两遗址的样本元素组成有异，推测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可能是本地烧造（《华夏考古》3期）。李宏飞等人运用 X 射线荧光技术分析了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岳石文化风格陶器，发现其与同遗址内其他器类在原料选择上相近，因而可能是由熟悉岳石文化制陶技术者在郑州地区制作而成的（《中原文物》3期）。

殷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仍是晚商考古的重点。

2012~2015年大司空村东地发掘的一处商代邑聚（《考古》12期）和2002~2008年间对安阳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的三次发掘（《考古》8期）有简要报道。

胡进驻考察了殷墟王陵穴位的排列，认为王陵西区是以居西的侯家庄北地一号墓为核心，系祖穴，其他七座四墓道大墓从早到晚、自东至西，南北交替作两排布列于祖穴东面，已经属于一种较为典型的昭穆制墓葬排列方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期]。唐锦琼对殷墟遗址铜器墓中陶器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其与铜器的使用方式有明显差异;而不同器类陶器的使用亦有差别(《考古》4期)。苗霞重新考察了位于小屯宫殿宗庙区内编号M34的遗迹,认为其并非墓葬,而应是水井或具有冷藏功能的窖藏坑(《中原文物》1期)。丁思聪将殷墟出土的玉石质戈、圭、璋统称为玉戈类器,认为三者实际上都是玉戈分化的产物,进一步指出“石璋”在殷墟四期的流行,可能与当时玉料来源的缺乏、礼制的僵化和随葬品的明器化相关(《殷都学刊》4期)。

赵春燕等人采用锶同位素检测技术追溯殷墟遗址中马的来源。在检测的10例马中有5例可能为本地出生,其余5例则来源各异(《南方文物》3期)。周文丽等人检测分析了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的两类熔铜器具的材质、工艺和用途(《南方文物》1期)。

晚商时期殷墟以外的商文化分布区也有重要的考古发现。河南禹州大吕遗址发现有商代晚期大型聚落和包含甲字形大墓的高级别墓区(《中国文物报》10月23日)。荥阳小胡村墓地清理商代晚期墓葬58座,出土的多件铜器上发现“舌”字铭文(《华夏考古》1期)。岐山王家嘴遗址2010年发掘的一座商文化京当类型的铜器墓得以报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1期)。《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报道有先周时期的墓葬。

对晚商文化的研究还涉及地方类型的年代、分布,以及墓葬与大型建筑的等级等。牛世山认为京当类型遗存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小双桥期,下限可晚到殷墟二期偏晚。时间上与先周文化有并行,空间分布上两者也有相当部分的重合(《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64期)。他还将京当型遗存在先周文化区中的分布概括为“据点式”模式(《考古与文物》6期)。陈翔对小胡村墓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墓地中随葬品组合清楚的M22、M28属殷墟二期晚段,墓主属“舌”族的中小贵族,生前从事军事和生产管理工作,但两人所属兵种不同。同时推测小胡村一带可能是晚商“舌”族的封地,而1933年被盗的安阳薛家庄殷墓墓主的身份应该是在商王室供职的“舌”族高级贵族或族长(《南方文物》4期)。杜金鹏考察了老牛坡遗址F2、F3两座大型建筑基址,认为二者属于商文化中等级较低的宫室建筑。老牛坡遗址作为商文化地方性中心城邑,其聚落等级不及盘龙城商城高(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庆贺徐光冀》)。

在考古实践中,方国都邑与军事重镇常常不易区分。王立新、王涛以三星堆和吴城两处明确的商代方国都邑为例,对比分析方国都邑和盘龙城城址等商王朝军事重镇的异同,以期深化对商代政治地理结构的了解(《江汉考古》2期)。也有部分研究涉及商文化中某类遗迹现象的解析。谢肃考察了商文化中与城墙相关的祭祀遗存,认为城墙在营造和使用过程中都存在祭祀行为,祭祀对象可能有所不同(《考古与文物》3期)。贺俊探讨了商人“腰坑”葬俗的来源,认为其与史前时期、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腰坑”葬俗没有直接关联,而是商灭夏后郑洛地区商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中国文物报》8月14日)。张兴照对商代邑聚的输排水系统作了整体考察,认为其应包括聚落内外、建筑单元和单体建筑三个层次(《华夏考古》1期)。

此外,吕鹏综合分析了商人对家养黄牛的开发和利用方式,发现商代黄牛主要用于肉食、祭祀、畜力和骨料来源四个方面(《考古》11期)。可谓近年动物遗存研究中的一篇力作。

有关先周文化的研究仍处于低迷阶段。仅梁云从葬式葬俗出发重新考察碾子坡商代遗存,认为其族属并非周人、商人或“阮”“共”之类的东方民族,同意将其与密须氏相联

系（《中原文物》6期）。孙庆伟对先周文化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顾，指出先周文化探索面临的困境，在于理论与方法问题而非材料本身（《江汉考古》1、2、3期），这是很有见地的认识。

北方长城地带商代遗存的研究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有所进展。2010年11月陕北子洲县关王坨村出土一组商代铜器。刘建宇等人分析了其中6件青铜容器的合金成分、铸造工艺及矿料来源（《文物》1期），另对这组铜器的铸造、加工工艺作了复原研究（《南方文物》1期）。内蒙古清水河西岔遗址的发掘资料尚未系统报道。吕智荣、孙战伟据已公布资料的分析，将西岔三期遗存归入李家崖文化，作为该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称为西岔类型（《考古与文物》4期）。2011年发掘的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是我国长江以北地区截至2015年已确认的年代最早的铜矿遗址。王立新、付琳从喜鹊沟遗址周边环境、地形地貌以及生业形态分析，认为该遗址是一处因采矿活动而存在的季节性聚落，采矿者的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畜牧和渔猎。结合以往辽西地区晚商青铜器的发现，推测包括喜鹊沟在内的大兴安岭南端铜、锡矿很可能是中原地区晚商铜、锡矿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考古》4期）。付琳、王立新还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消亡后辽西地区所呈现的纷纭复杂的文化面貌进行了辨析，依陶器群特征将该地区晚商至周初阶段的遗存区分为后坟类、魏营子墓葬、向阳岭类、喜鹊沟类、柳南墓葬五类遗存（《考古》8期）。

围绕早期巴蜀文化所开展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方兴未艾。成都市新都区2010~2011年发掘的高家院子遗址（《考古》4期）和同盟村遗址（《四川文物》5期）均有十二桥文化遗存的介绍。《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系统刊布了罗家坝遗址发掘所获早期巴文化的材料。《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则刊布了重庆合川区河嘴屋基与猴清庙遗址的商周时期遗存。泸定县坪上遗址也发现有商周时期遗存（《四川文物》6期）。

由于2014年广汉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再次成为早期巴蜀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陈德安、杨剑探讨了三星堆城址的布局、功能和城建技术渊源等问题。陈显丹则着重分析了三星堆城址的平面布局。敖天照依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璞玉、籽玉、玉料等，对遗址范围内的玉器作坊地点、原料来源、制作工艺等进行了初步研究。王方考察了成都平原自宝墩文化至十二桥文化阶段的石器制作技术及其发展历程。张肖马剖析了三星堆Ⅱ号祭祀坑所出青铜树与东汉墓葬出土摇钱树之间的内在关联（以上均见《方国文明》）。施劲松指出，十二桥遗址早期地层中出土有大量三星堆文化典型陶器，表明该遗址早期遗存或属于三星堆文化（《考古》2期）。白九江、李大地认为，峡江地区商周时期遗存可统称为“石地坝文化”，属于十二桥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庆贺徐光冀》）。

陈坤龙等人对陕西城固苏村出土商代铜器进行了合金成分和金相组织分析，发现苏村小冢出土的三角援戈、锡、面饰等器类的铸造技术与合金配比，同本土冶铸传统有较大差异，有可能产自关中或其他地区（《考古与文物》3期）。

2015年度报道了湖北大冶香炉山冶炼遗址的调查材料，其中年代偏早者可至商代。李延祥、崔春鹏等人检测了该遗址采集的炉渣样品（《江汉考古》2期）。其他地区商代遗存的发现不多，研究也十分有限。浙江宁波镇海鱼山遗址（《中国文物报》3月13日）、贵州天柱县溪口遗址（《四川文物》2期）均包含有商代遗存，但与周代遗存的界限不易区分。2005年青海省民和博物馆在喇家遗址北区发掘的5座辛店文化的墓葬得以



报道（《考古》3期）。

### 三 西周

围绕周原与丰镐两大都邑的研究热度不减。

2015年度报道的周原凤雏三号建筑基址，是截至2015年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西周建筑遗址。发掘者认为此处建筑应是西周的社宫，庭院中的立石是社主，是周王朝祭社活动最明确的证据。曹大志、陈筱也持相同观点，还对该建筑基址的柱网结构进行了复原，认为该建筑的梁架结构处于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的阶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7期）。孙庆伟对此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凤雏三号建筑基址应是殷遗民在周原所建的亳社，且该建筑基址与早年发现的凤雏甲、乙组基址应属同一组建筑群。这组建筑址与其南侧的墓葬区，以及庄白建筑基址和铜器窖藏，共同构成了一个商遗民的居邑，与微史家族关联密切（《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66期）。2013年在贺家村西发掘的一座西周中晚期的铜器窖藏，出土车马器、乐器和工具共计102件，是周原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1期）。以上的发现和研究，对于从整体上认识周原的性质与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丰镐遗址的墓葬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张礼艳的《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地层学和类型学相结合的方法，构建起丰镐地区西周遗存截至2015年最为全面、系统的分期编年体系，为西周遗存的分期断代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标尺。该书首度对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从中成功区分出周人墓葬区和殷遗民墓葬区。张礼艳、燕妮由墓葬材料出发分析了西周丰镐、洛邑和岐邑的人群构成，注意到三个都邑的人群主体均由周人和殷遗民构成，但各都邑内两类人群所占比重不同，其原因应与各都邑所设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相关（《东北史地》6期）。付仲杨、宋江宁等指出，丰镐地区在西周中晚期已存在盗墓现象，盗洞多选择在紧邻墓室边角的位置，盗掘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获得墓葬中珍贵的随葬品（《南方文物》3期）。

针对宝鸡石鼓山重大考古发现而开展的研究依然引人注目。张天恩赞同石鼓山墓葬的族属应与羌戎有关，并将随葬青铜器划分为殷商文化系统、先周文化系统和时尚器用三类，认为后一类器物的铸作年代略晚于前两类，当在商周之际（《文物》1期）。林森也同意多数学者关于该墓地族属的看法，但是认为石鼓山M3中出土的十余种不同族徽铭文的铜器，应是墓主跟随武王灭商后所分得的战利品（《边疆考古研究》17辑）。陈坤龙等人检测了石鼓山2012年发现的西周铜甲，发现其主体成分接近硫化亚铜，夹杂少量铁的硫化物，系在铸造后经热锻成形，并以孔雀石颜料于表面绘制纹饰。研究小组还推测该铜甲应为“整片式铜铠甲”，是受西方锻造技术影响，并结合本地皮甲的传统形制和装饰特点制作而成的（《文物》4期）。此外，《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报告》也报道有部分西周墓葬。

围绕洛邑遗址开展的工作有限。2011年在洛阳市瀍河区发掘8座西周早中期平民墓葬，其中5座应为殷遗民墓葬（《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1期）。宫万琳结合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邙洛墓志，考证成周城应在今洛阳老城至瀍河两岸一带，只是城圈尚未找到（《中原文物》4期）。

西周封国地区的考古发现以河南地区最为丰富。禹州大吕遗址发现有西周墓地，包括

大中小型不同规模的墓葬和车马坑。发掘者推测其应为一处西周公族墓地，可能与早期许国或吕国有关（《中国文物报》10月23日）。《荥阳官庄遗址》（科学出版社）报道了2010~2011年官庄遗址的发掘收获，其中以西周晚期遗存最为丰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围绕官庄遗址开展的系统调查表明，西周晚期前后，该遗址周边区域内的聚落和社会格局经历了一次重新整合，或许与东虢的分封有关（《中原文物》4期）。2015年度报道了1993年发掘的平顶山应国墓地M257。墓主属于应侯家族成员，应为士一级的贵族（《华夏考古》3期）。此外，新郑市寺东高遗址（《中原文物》5期）、淅川单岗遗址（《江汉考古》4期）、淅川龙龙岗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7期）均发现有西周时期遗存。

其他封国地区的相关发现和报道不多。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滕州前掌大墓地又抢救性发掘了一座被盗的西周早期墓葬（《文物》4期）。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发现大中型墓葬和车马坑，出土遗物丰富，应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公族墓地，为研究曾国历史与周代封国制度提供了又一批重要资料（《江汉考古》3期）。镇江博物馆报道了马脊墩土墩墓的发掘材料，将其定性为西周晚期吴国高等级贵族墓（《东南文化》3期）。

有关曾国墓葬的研究依然是周代封国考古中的一个热点。常怀颖梳理了两周时期曾国车马葬仪的演进历程，认为其最初基本遵循周系的车马葬仪，此后受楚文化影响渐强。但墓室殉车始终不为曾侯葬仪所重。他还发现，曾侯夫人的车马葬仪虽较曾侯为低，但较楚国女性贵族为高（《江汉考古》5期）。任雪莉通过对叶家山墓地曾侯谏器组分流情况的分析，提出曾侯及夫人墓的早晚应排列为M111、M27~M28、M2~M65、（M3?）[《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期]。周书灿认为，叶家山M65所出青铜器铭文可证今湖北随州一带的姬姓曾国至迟于西周康王时期即已存在。西周晚期联合申国召犬戎伐周的缙，可能就在今湖北随州一带（《中原文物》5期）。杨勇总结了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相关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期）。

对其他西周封国遗存的研究缺少重点，但涉及内容仍颇为丰富。牛世山比较了殷墟及周边地区的西周遗存，发现殷墟范围内分布着较为典型的西周文化，而周边地区的西周遗存则有浓厚的殷商文化风格。由此推断，周人所迁的殷遗民，其主体应源于殷商故都内以家庭为单元的族群（《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66期）。井中伟等人对安阳王古道村的两座周代贵族墓葬（M1、M2）的年代及部分器物的定名作了重新检讨（《考古与文物》5期）。马萧林、魏兴涛等人对三门峡李家窑遗址出土骨器成品、坯料和废骨料所反映的骨器制作工艺流程、生产规模等进行了考察，并认为该遗址的骨器生产主要是由个体手工业作坊来经营的，且制骨作坊与屠宰场可能保持有长期的协作关系（《文物》6期）。张长寿由平顶山应国墓地M84的葬仪分析入手，辨析了西周中晚期姬姓诸侯墓地在丧葬礼俗方面的异同（《新世纪（续）》）。

景耀忠重新探讨了天马一曲村遗址铜礼器墓的分期、年代和埋葬习俗，将铜礼器墓划分为三期六段，认为其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文物天地》3期）。王宏、权敏对据传出土于山西的一批贾国青铜器做了重点分析（《中原文物》1期）。冉宏林对琉璃河ⅡM251墓主的族属、性别、等级等进行了重新观察，认为该墓应系高等级殷遗民墓，墓主为伯矩配偶的可能性更大，并由此讨论了西周时期“多族徽多人名墓葬”墓主的身份判定方法（《方国文明》）。《琉璃河遗址与燕文化研究论文集：纪念北京建城3060年》（科学出版社）一书收录了1995年至2015年内有关琉璃河遗址和燕文化的研究成



果。曹斌重新检讨了前掌大墓地的年代与族属,认为该墓地应是“史”国墓地,而非薛国遗存,前掌大一带很可能是商末弃商投周的殷遗“史”族在西周早期的封国(《考古与文物》2期)。

2015年度报道的周边地区西周时期遗存材料不多,且多集中于东南地区。2013年安徽铜陵夏家墩、神墩遗址的发掘发现有西周早期的炉基、炉壁及配套设施,是冶金考古的重要收获(《江汉考古》6期)。谢军介绍了繁昌发现的3件西周晚期铜器(《江汉考古》6期)。此外,安徽怀宁孙家城(《江汉考古》2期)、浙江宁波庶来(《南方文物》4期)、江西宜黄汪家(《文博》5期)、广东龙门庙山(《四川文物》6期)等遗址也均包含西周时期遗存。

对周边区域西周时期遗存的研究呈现出选题多样化的特点。何晓琳将宜昌万福垆遗址H1、H2出土陶器的年代定为西周晚期,认为其应归属周文化荆南寺类遗存(《楚文化研究论集》11集)。赵东升考察了赣鄱地区西周时期的文化格局,指出该地区在西周早期曾经西周文化短暂经略,西周中晚期,随着周文化势力的减弱,逐渐成为吴越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之地(《江汉考古》4期)。赵欣等人对淳化枣树沟脑遗址西周中晚期马坑出土马骨样本进行遗传学分析,检测结果显示出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并暗示该地区在西周时期或许存在马匹的贸易交换(《南方文物》3期)。张全超等人检测了赤峰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祭祀坑”出土人骨的稳定同位素,结果显示这批居民是以粟、黍等C4类植物为主食(《考古与文物》4期)。蔡昕欣从图案学角度对白金宝文化陶器纹饰的类型、组合、布局及整体风格等进行了分析(《北方文物》2期)。从总体上看,2015年对于西周封国以外地区遗存的研究大多缺乏明确的目的性,科技检测工作的问题意识也有待加强。

还有少量跨区域、跨时段的综合性研究。张天宇讨论了商末周初铜礼器墓中常见的“一墓多族徽”现象,认为以往被断为商代晚期的“一墓多族徽”的墓葬,甚至商文化控制区内出现的族徽构成“多而杂”的墓葬,其年代均应进入西周早期(《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67期)。此说有一定新意,但族氏的分彙、氏族间的通婚等皆可造成一墓多族徽的现象,如何将这些现象与周初的分器现象相区分,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褚晓波、张童心通过对山东、淮河—长江流域、冀北平原、泾渭河上游四个地区西周遗存构成的分析,试图揭示西周王朝疆域形成时所采用的策略及其规律(《东南文化》3期)。李清临对周代砖瓦窑进行了分类,进而探讨了不同阶段砖瓦窑的形制和结构特征、建筑方式及砖瓦生产专业化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中原文物》1期)。

## 四 东周

2015年度东周考古仍以城址和墓葬为研究重点。在地域上,考古发现的集中区与研究重心已由三晋两周地区转移至楚文化区。

### 三晋两周地区

2012~201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为配合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在漯河市固厢墓地Ⅱ区发掘了102座战国墓葬。2015年度报道了部分战国中晚期墓葬的材料(《文物》8期)。禹州大吕墓地也有战国墓葬的简要介绍(《中国文物报》10月23日)。

张亮、滕铭予探讨了晋南地区东周铜器墓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阶层变迁等问题,认为政治因素是造成墓主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主要原因(《考古》6期)。徐团辉结合考古材料论证了战国初年韩国迁都宜阳、阳翟记载的可信性。同时指出,韩国在迁都宜阳、阳翟之后,平阳仍继续作为政治中心使用。宜阳和阳翟是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临时性都城,带有战时陪都的性质(《华夏考古》2期)。顾万发介绍了郑州祭城镇古城的重要发现,并对该城的性质等相关问题作了细致分析(《华夏考古》3期)。史家珍、吴业恒撰文认为,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应属祭祀现象而非陪葬坑。东周王室之所以在此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意在宣示周王天下共主的身份(《庆贺徐光冀》)。

### 秦文化区

《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报道了91座春秋秦墓和车马坑的资料。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千河下游开展了全覆盖式调查,发现东周、秦汉时期遗址40余处。其中多个地点发现有夯土基址及砖、瓦等建筑材料,推测很可能是离宫别馆类建筑遗迹(《考古与文物》3期)。在西安东郊“韩森冢”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亞”字形大墓1座,陪葬坑2座。墓葬形制与秦东陵中主墓的形制结构比较接近,推测应属战国秦王陵级墓葬(《考古与文物》2期)。

丁岩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勘探资料,将咸阳原上的严家沟村北Ⅰ号陵园和周陵镇Ⅱ号陵园与唐代咸阳县址之间的相对位置、距离进行了比勘,指出前者应是秦永陵,后者应是秦公陵(《考古与文物》2期)。梁云、田亚岐探讨了雍城秦公陵园的墓主及排序,认为每一座陵园只对应一位国君,一座陵园内的多座大墓,反映了一代秦公与其夫人、次夫人的并穴合葬关系,同时确定了陵园的布局规律,即秦公墓在陵园内西南,秦公夫人、次夫人在陵园内东北,陪葬墓区则分布在陵园外东北(《考古与文物》4期)。孙战伟将清涧李家崖东周秦墓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第一阶段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墓地性质为晋系文化遗存;第二阶段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墓地性质为秦文化遗存(《南方文物》3期)。林源、张文波考察了秦都的建筑排水设施及排水方式(《华夏考古》2期)。

### 楚文化区

多年来,楚墓的材料始终层出不穷。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2014年的发掘共清理春秋时期墓葬42座。发掘者推测墓地内埋葬的是铜绿山矿区采冶活动的低级管理者、技术人员和矿工(《江汉考古》5期)。勘探表明,荆州冯家冢墓地是由2座大型封土墓、100余座陪葬墓及2座大型车马坑等组成的一处陵园,墓主应该是战国时期某位楚王及其王后(《文物》2期)。已发掘其中的7座小型楚墓(《文物》2期)以及陪葬墓BXM1周围的9座祭祀坑(《文物》2期)。《武当山柳树沟墓群》(科学出版社)中报道有9座战国时期墓葬。南漳川庙山墓地2014年发掘有23座陶器墓,年代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江汉考古》4期)。谷城尖角墓地被盗后追缴回一批文物,其中战国时期的遗物应出自一座楚贵族墓葬。报道者结合“隗子曾”铜壶铭文,推测该墓地是芈氏宗族的墓地之一(《江汉考古》3期)。2014年襄阳卸甲山村发现一批春秋中期的青铜器,包括鼎、缶、盘、盃、器盖共7件(《江汉考古》3期)。湖北荆州曹家山(《江汉考古》5期)、望山桥(《中国文物报》2月27日)、安徽淮南胡台孜(《东南文化》3期)、河南淅川申明铺(《考古》5期)等墓地,均发现有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淅川新四队墓地》(科学出



版社)也介绍有战国时期墓葬。此外,2015年度报道的南阳市万家园 M199(《江汉考古》5期)和华鑫苑小区 M124(《华夏考古》3期),分属春秋早期早段和春秋晚期早段。

湖北宜昌万福垆遗址经过调查勘探,基本明确是以春秋时期遗存为主的大型聚落遗址。在其周边还发现有杨家咀、桂溪湖、中沙湾三个遗址(《江汉考古》5期)。鄖县尖滩坪遗址也报道有东周楚文化遗存(《江汉考古》3期)。《沅陵窑头发掘报告:战国至汉代城址及墓葬》(上、下)(文物出版社)一书表明,窑头城址始建于战国中期,汉初废弃,性质为沅陵县城。位于沅江中游的老屋脊遗址,以战国秦汉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出土封泥上的文字为研究楚秦时期的古县邑提供了新史料(《湖南考古辑刊》11集)。江西抚河流域调查中新发现的乐安黄泥坪遗址,主体年代在春秋时期(《文博》4期)。

2015年度楚文化的研究集中见于《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书中收录“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的会议论文,汇集了对早期楚文化、楚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城址以及楚墓出土各类器物等多方面的研究。其中楚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是此次会议的研讨重点。宋亦萧从楚文化遗存中辨识出六种域外文化因素,并据此探讨了楚文化与域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及其路线。魏贇通过对楚文化中高、鼎类器物的分析,试图揭示楚文化与同期黄河中游文化遗存的关系。杨权喜提出周梁玉桥周代遗存应系濮文化,并考察了楚文化与濮文化的关系。韩严振分析了楚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影响。粟慧探讨了东周时期三峡地区楚人制瓦技术的源流及其与巴文化的关系。张义中提出,楚国的扩张及楚文化的南渐,推动了腰坑习俗向岭南地区的传播。李全立则探讨了陈、楚关系以及周口楚墓的形制与特征。对楚墓出土器物的研究是此次会议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顾久幸分析了荆州楚墓出土的玉器以及楚地的玉文化传统、玉器的功能和意义等。王蔚波考察了河南出土春秋虎形玉雕的装饰工艺。聂菲考证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木辟邪”实应为家具凭几。周玉端指出楚墓中的“匕首”实际上是明器化的剑。王从礼认为楚墓中的贝形器是马的饰件,依其功用和形制,可定名为“贝形马饰”。胡永庆考察了浙川楚墓出土青铜器的组合、铸造工艺以及装饰艺术和铭文等特征。王先福依据枣阳九连墩二号楚墓出土马器的位置、类别、数量,参照秦始皇陵出土铜车马,对马勒进行了推测复原。罗运兵、陈斌对楚墓中鹿角的性质及象征意义进行了分析。后德俊综合考察了楚墓出土竹简的制作工艺。早期楚文化与楚国城址为以往研究所关注。在此次会议中,陈振裕总结了寻找早期楚都丹阳与探索早期楚文化的方法,以及研究中需要注意的线索。郭德维再次论证季家湖古城是春秋时期的楚郢都。龚长根认为鄂王城并非楚国别都,而是战国时鄂君启受封的故城。付梦丽、王然考察了东周时期随枣走廊地区陶器的文化面貌,认为其与典型周文化关系密切,同时又显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在年会论文之外,楚墓依然是研究关注的焦点。陈丽新、陈树祥考察了四方塘墓地与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关系,认为四方塘墓地应是当时矿区内不同级别管理者的公用墓地(《江汉考古》5期)。张闻捷通过考察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铜器,将墓葬年代定在战国初期吴亡之后,推测墓主人是楚国番县贵族而非吴王夫人季子(《华夏考古》2期)。陶亮、于璐研究认为,浙川下寺、和尚岭及徐家岭墓地应同属楚国早期的鬬氏家族,始于克黄改命之后。和尚岭、下寺、徐家岭三处墓地分别是以鬬克黄、鬬成然、郈公鬬辛为中心形成的墓葬群(《中原文物》4期)。张昌平发现,襄阳卸甲山墓葬出土的一组春秋中期青铜器,其特征与同时期楚文化青铜器不同,而类似于江淮地区青铜器,并由此进一步考察了江汉和江淮两个地区的文化联系(《江汉考古》3期)。王少青、穆乐等人考察了

周口市楚都陈时期的考古遗存（《中原文物》4期）。王树芝、赵志军等人鉴定了九连墩楚墓出土的113件木质遗物的植物种属（《新世纪（续）》）。

随州文峰塔墓地是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曾国贵族墓地，也是近年来东周曾国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2015年度报道的文峰塔墓地M4，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早，应属曾侯墓葬，墓内一件编钟的铭文中“左右楚王，弗讨是许”，发掘者认为其印证了“曾即随说”（《江汉考古》1期）。对此，张昌平重申曾非随的意见，认为在青铜器铭文中，曾和随是两个不同的名称，不仅这两个国家自己区分明确，楚国也对二者有明确区分。新材料恰恰证明了传世文献记载的随地已经出现了随国青铜器，“曾随合一”假设的前提已不复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1期）。曹锦炎介绍了4件铸有“曾子”之名的青铜戈，并将其年代断于春秋中期偏晚（《江汉考古》1期）。

### 齐鲁文化区

2015年度山东大学考古系对邹城邾国故城遗址的发掘，出土多件带有陶文且规格等差的陶量，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官方陶量（《中国文物报》10月23日）。临淄范家村（《文物》4期）、临沂姜墩（《中国文物报》10月9日）两处墓地均含有东周时期的墓葬。宿迁青墩遗址2009年采集到一件有纪年和自铭的铜戟刺，属韩国兵器（《文物》2期）。

郑同修探讨了齐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包括齐文化区域概念的界定、齐文化的形成以及2015年研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庆贺徐光冀》）。王青、张云涛以黄水河流域周代墓葬材料为中心，研究了莱文化的发展历程、文化特征、典型器物、文化构成和分布范围等（《方国文明》）。石学军、王雁等人对即墨故城的盛衰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管子学刊》4期）。印群通过对东周齐国殉人陪葬墓的比较分析，探讨了战国早、中、晚期齐殉人陪葬墓的嬗变历程（《管子学刊》4期）。

### 北方文化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2年在黄陵史家河墓地发掘战国墓葬37座，出土遗物丰富（《考古与文物》3期）。孙周勇、孙战伟等人探讨了史家河墓地的年代、布局、墓葬特征及族属等问题，认为该墓地在战国早中期是一处与魏国关系密切的戎人墓地；至战国晚期，该墓地已成为秦人的一处葬地（《考古与文物》3期）。刘建宇等人检测分析了陕西横山黑水沟遗址出土的炉渣、坩埚残片及铜器残块等冶铸遗物，结果显示该遗址应存在本地的青铜加工业，但冶铸生产规模相对较小，产品以工具等小件器物为主（《南方文物》1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漳县墩坪遗址北部墓地进行了勘探和发掘，了解到其属于一处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戎人墓地（《中国文物报》6月19日）。2014年马鬃山玉矿遗址寒窑子草场、径保尔草场两个地点的调查和发掘材料于2015年度报道，为了解当时的采矿规模和聚落等提供了重要材料（《考古》7期）。李维明研究发现，以往被学界视为沙井文化典型遗址的金川三角城遗址，其实自身特征明显，可考虑定名为三角城类型或三角城文化（《考古与文物》5期）。

东大杖子墓地是近年来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2015年度简要报道了该墓地2000年和2003年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墓葬主要属战国时期（《文物》11期、《边疆考古研究》18辑）。2012~2013年在大凌河流域上游开展的区域考古调查，发现青铜时代至战国秦汉遗址30处，为深入认识东大杖子墓地的性质及相关遗址的分布等提供了



重要材料（《边疆考古研究》18辑）。成璟璐、孙建军等人介绍了葫芦岛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些收缴或征集的东大杖子墓地出土器物，包括铜器、玉器及1件金质剑柄筒口部（《文物》11期）。华玉冰、成璟璐等人总结了东大杖子墓地的工作情况及主要收获，并对该墓地的年代、布局、文化性质与族属等进行了探讨（《庆贺徐光冀》）。王丹鉴定了东大杖子墓地M32出土织物，认为其纤维成分为大麻，组织结构为平纹（《边疆考古研究》18辑）。王贺、柏艺萌对东大杖子墓地出土薄壁青铜器的检测结果显示，这些器物是锻打制成的铅锡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18辑）。

### 巴蜀文化区

2015年度该区东周考古处于低落期。2014年在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地点发掘的4座战国土坑墓，出土了一批铜器、陶器，其中3座为船棺葬，是广汉市内的首次发现（《四川文物》4期）。张媛认为，成都羊子山出土或采集的5面战国铜镜属于仿楚式镜风格的本地铸造器物（《四川文物》5期）。严志斌、洪梅考察了战国巴蜀文化中的壘形符号，认为其当源于青铜壘的形象，具有身份等级含义，并对其分布、发展和流布等进行了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1期）。

### 吴越群舒文化区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凤阳南郊乔涧子发掘1座春秋墓（编号M2），系竖穴土坑木椁墓，是首次发现的春秋晚期钟离国贵族墓葬（《江汉考古》2期）。2015年度还报道了镇江庄连山（《东南文化》3期）、苏州大墩（《东南文化》5期）、观音山（《东南文化》5期）等地点发现的春秋中晚期墓葬。

林森通过分析钟离国相关的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古文字材料，肯定了钟离国的族姓为嬴姓，以伯州犁为始的钟离氏则为子姓。钟离国大约是在钟离君柏去世之后到昭公四年楚人在钟离修城以防御吴国之前的这段时间之内被楚国灭掉（《考古与文物》5期）。

### 其他地区

《延庆胡家营——延怀盆地东周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刊布了胡家营东周聚落遗址的发掘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王争梳理了燕文化分期的研究现状，并提出对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文物春秋》2期）。

广州增城浮扶岭遗址M511于2015年度报道，其年代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南越国早期，是发掘区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墓葬，由墓道、封门及椁室组成，推测墓主是越人部落的首领或上层贵族（《文物》7期）。

## 五 专题

### 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

跨区域、跨时段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研究仍是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的主流，但也有一些研究将视野扩展到聚落形态变迁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领域。

戴向明系统梳理了晋南地区龙山至夏商时期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性质、年代和谱系

关系,认为该地区从龙山到二里头阶段的转变并非本地文化传统自然延续或演变的结果,而是被郑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直接取代后形成新的文化类型(《庆贺徐光冀》)。张渭莲、段宏振的《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格局》(文物出版社)一书,构建了先秦时期太行山东麓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并对不同时期文化格局的演变及其动因进行了分析,可谓区域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

薛河流域是山东地区古遗址分布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2010~201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东大学合作对该流域开展了区域性考古调查,共发现遗址和遗物分布区180余处。了解到该区域在大汶口文化至商代这一漫长的阶段聚落发展处于稳定期,而自西周开始聚落的演进步入高速发展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燕生东考察了晚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分布态势,以及周初东方诸分封国的位置,发现东方地区周初封国均位于晚商文化分布区内,目的可能是便于控制和管理东方地区的殷商遗民(《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66期)。魏峭巍对鲁北地区商周时期东夷文化遗存进行了综合梳理,认为鲁北夷人文化系统并未被商文化完全取代,珍珠门文化在该地区可延续至西周中晚期,西周中期后逐渐融入周文化系统(《中原文物》4期)。李龙海对两周时期海岱地区的华夏化进程进行了分析(《中原文物》1期)。

从德新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存划分为八个文化区,并探讨了各区域间的文化联系(《新世纪(续)》)。林梅村通过分析中国境内发现的塞伊马—图尔宾诺文化遗存,探讨了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在史前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及其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文物》10期)。刘学堂亦强调夏文明的形成与史前“青铜之路”的相关性,认为青铜冶制、小麦种植等技术因素的输入,推进了中原地区的社会集约化程度,对中原文明体系有重构效应(《中原文物》3期)。杨建华、邵会秋则考察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指出在战国晚期和汉代初期,长城的建立促使了中国北方地区人群的分化,部分早先南下的北亚人群退到长城以北,在文化上融合了西面欧亚草原的因素而形成了匈奴文化。南北交往的受阻又促使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期)。邵会秋、杨建华还探讨了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与欧亚草原文化间的联系,指出自公元前9世纪末开始,欧亚草原的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的交往路线被彻底打通,整个草原地区第一次构成了一个大的整体(《考古》10期)。

朱永刚、唐森将吉林省境内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依自然地理和文化面貌划分为西、中、东三个文化区。其中以西区松嫩平原的文化发展脉络最为清晰(《边疆考古研究》17辑)。

邹后曦、白九江在梳理重庆地区先秦文化序列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巴文化的源流、葬俗等问题(《庆贺徐光冀》)。江章华对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聚落的分布、规模、结构与变迁动因等进行了考察,认为成都平原史前人群应来自岷江上游,并逐渐向平原腹地移动;岷江冲积扇上未发现三星堆文化聚落可能与洪水有关(《考古》4期)。赵炳清对先秦巴蜀地区的人口迁徙、文化交流以及巴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作了讨论(《四川文物》4期)。

杨式挺、邱立诚等人的《广东先秦考古》(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书,将广东青铜时代文化划分为商时期和周时期两大阶段,进而对各阶段的房屋建筑、埋葬制度及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的生产和使用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



## 墓葬研究

方辉通过考察考古发现中朱砂使用的案例，结合传说和文献记载，对朱砂在史前及夏商葬仪中功能地位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了研究（《文史哲》2期）。雒有仓对商周家族墓地出土复合族徽铜器的墓葬类型（《四川文物》6期）、葬制和葬俗（《考古与文物》2期），以及复合族徽铜器的种类和组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等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复合族徽应是族氏分化、族氏联姻或联盟关系的表征。

宫希成对安徽漳河流域周代土墩墓群的年代、分布、结构、营造方式及社会背景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土墩墓在该区域的大量密集存在应与周代对区域内铜矿资源的开发密切相关（《庆贺徐光冀》）。付琳分别考察了江南地区商周时期土墩墓的祭祀遗存（《东南文化》3期）与周代土墩墓“一墩多墓”的结构与形式（《南方文物》3期）。他将土墩祭祀遗迹划分为“墓下祭祀”“墓前祭祀”“墩上祭祀”和“墩脚祭祀”四种形式，而将“一墩多墓”划分为向心结构与不规则结构两种形式。他认为，在向心结构的土墩墓中，中心墓葬与周围墓葬之间主从关系明显，这类墓大致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集中发现在茅山两侧的宁镇丘陵地区；而不规则结构的土墩墓，大多系晚期墓葬选建于早期土墩之上或之旁而逐渐形成，墩内墓葬之间不具备明显的主从关系，是江南地区土墩墓中“一墩多墓”的主流形式。

唐森依据墓葬的构建特征和埋葬方式，将东北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大石盖墓划分为四型，并对不同区域内此类墓葬的形制、随葬器物、文化特征与年代等进行了探讨（《边疆考古研究》17辑）。陈云洪对四川地区船棺葬的葬具、随葬品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将船棺葬分为四期，年代从西周晚期到西汉初期，推断其族属是蜀人开明氏一族（《边疆考古研究》17辑）。

## 青铜器研究

对青铜器的研究仍然以单类器物为主，但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器物的类型学分析，也涉及器物的定名、功用、源流、分布与传播等诸多方面。

在青铜容器研究方面，张懋镛、沙忠平分析指出，宝鸡地区出土青铜簋具有年代早、数量多、体量大、成组合的特点，说明青铜簋最先应兴起于宝鸡地区。这与该区域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关，也与当时重食的文化氛围相关（《文博》1期）。毕经纬综合考察了铜铏的形制与演变、分期与年代、起源与流布、区域特征、功用、使用人群及其在铜容器组合中的地位等，认为铜铏产生于两周之际的鲁东南地区，由当地东夷人创造，存在自东而西的传播过程（《考古学报》4期）。曹斌对青铜斛的定名与器用（《北方民族考古》2辑）、起源（《南方文物》4期）、分布和区域特征（《文博》5期）、时代性与族属（《文物春秋》3期）等问题分别作了细致讨论。王世民考察了青铜盃在商代青铜礼器组合中的地位，认为随葬方盃者身份较高，也有个别身份特高者既用方盃，也用圆盃（《新世纪（续）》）。张昌平、汪涛考察了2012年重现于纽约苏富比秋季拍卖会的东周陈侯壶，对该壶的纹饰、铭文及铸造工艺等做了细致分析（《文物》3期）。裴书研收集整理了1178件商周青铜壶，依类型学分析将青铜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指出其间曾出现两次器形更替和三个发展高峰（《考古与文物》3期）。陈小三认为“棚叔壶”的器身可能是在器盖铭文的基础上，结合近年重要考古发现而伪造的。作册吴盃的年代应相当于

西周晚期的厉王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他还指出，平顶山应国墓地 M85 出土的铜盃（M85:15）属于吴越风格，其年代不晚于西周早期偏晚，推测吴越地区青铜器生产的上限可提早至西周早期（《考古》5期）。针对由后母戊鼎定名而引发的争论，李维明梳理了后母戊鼎的研究历程（《中国文物报》6月19日、7月3日、7月31日）。张庆、方敏研究认为，王子午鼎的造型特征系受到楚庄王审美观念的影响，而非“楚灵王好细腰”的结果（《中原文物》2期）。张爱冰则考察了江淮地区牺首鼎的年代、渊源及其标志的族群与文化（《考古》1期）。徐良高考察了尊类器物的定名及性质界定的过程，指出对该类器物的认知是层累地积成的结果，并非实证的结论和历史的真实（《南方文物》1期）。

青铜兵器仍是青铜器研究中的热点。高江涛、胡保华、刘翔等人围绕中国境内发现的塞伊马—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展开了热烈讨论。高江涛将此类铜矛划分为两型，并将多数标本的年代断在公元前1800~前1600年，认同该类器物是经由天山北麓、河西走廊而逐渐东传至晋陕高原、中原腹地及丹江流域的认识，进一步认为中国境内发现的此类铜矛很可能属于礼仪用品而非武器（《南方文物》4期）。胡保华将倒钩铜矛归为他所划分的夹叶阔叶类铜矛的一个小类，认为该类铜矛系齐家文化人群“仿制”欧亚草原地区同类器的产物（《江汉考古》6期）。刘翔将该类铜矛划分为三型，断其年代为公元前2100~前1100年，认为山西省工艺美术馆所藏的一件系目前所见形制最早的，说明山西有可能是塞伊马—图尔宾诺文化因素通过草原南传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站（《文物》10期）。刘瑞等人检测了这件倒钩铜矛的合金成分（《文物》10期）。井中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著《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庆祝魏存成》）、严志斌（《考古》5期）分别对西周半环形钺的形制演变、年代及源流等问题做了探讨。二人均认可半环形钺源于卷首刀，属礼仪性兵器，多出于高等级贵族墓，是重要的权力象征物。朱延平探讨了铜钺的起源，认为颈部斜收的扁茎钺是铜钺中较早的形制，其前身可能是同样形制的石钺，并指出辽东及周边地带应是石钺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庆贺徐光冀》）。刘延常、徐倩倩等人分析发现，山东地区所见周代青铜钺中的绝大多数应为晋钺，该类兵器除了具有指挥、军旌标识和壮军威的功能外，还有仪仗和打击功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成璟璐、高振海研究认为，辽西地区所见短内式铜戈产生于当地短茎式铜剑文化与燕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又以辽西为据点，传播至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年代横跨整个战国时期，下及秦汉之际（《庆祝魏存成》）。孟琦、彭博对中国北方地区春战之际流行的鹤嘴斧的功能、用途及来源问题进行了分析（《北方文物》2期）。郭富对川滇石棺葬出土青铜戈的年代、分期、来源及使用方式等做了探讨（《方国文明》）。郭妍利、陈昱浩回顾了商周青铜兵器的研究历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期〕。

还有一些关于其他类别青铜器的研究。高西省分析了目前所见西周楚公编钟的形制、纹样和组合特征，认为西周时期楚人编钟在甬钟合瓦、柱甬形制、编组（8件一套）、音列设计等方面均沿用周制，但纹饰已具自身特色（《文物》1期）。郎剑锋将东周晚期吴越地区的青铜杖饰视为简化的太阳树，认为这是该地区自河姆渡文化以来太阳崇拜传统的延续（《东南文化》4期）。丁兰、张莹莹分析认为，随葬青铜器座是东周时期跨族群的大区域文化现象。而春秋中期晚段出现的楚式“镇墓兽”，其基本构型当源于青铜器座。二者同样具有引载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功用（《江汉考古》5期）。胡健、玉米佳提出，战



国以前的“翬”应特指羽扇，由羽毛和青铜羽座组成，而“山”字形薄铜片或为“翬”的铜羽座（《中原文化研究》5期）。孙明搜集了商周时期的悬铃类铜器，对该类铜器的分布、起源、传播及悬铃的功能做了探讨，认为该类铜器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与商周青铜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北方民族考古》2辑）。马艳对中国境内包括战国时期在内的涡纹牌饰（《考古与文物》3期），孙璐对东北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车马具（《草原文物》2期），均做了截至2015年最为全面而系统的探讨。李帅指出，滇西高原青铜时代墓葬中出土的鸡形饰杖首和铜马俑是该区域存在鸡、马信仰的物质反映（《考古与文物》4期）。

有关青铜器的综合研究主要着眼于区域特征、文化互动、器用制度、装饰艺术等方面。韩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增补完成的。该书对中原地区所见夏商西周时期北方系青铜器的类型、年代、分布、来源及其反映的中原与北方文化间的关系等做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孙晓鹏、韦姗杉以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北地区的相关遗存为例，探讨了夏商西周时期北方融合型青铜器的分布、传播及其反映的文化关系（《中原文物》5期）。陈小三系统论证了早商文化的北进对北方地区青铜容器的铸造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边疆考古研究》17辑）。伴随楚文化研究的趋热，楚系青铜器研究亦成关注焦点。袁艳玲、张闻捷对楚系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4期）、袁艳玲对楚墓的用鼎制度及其背后的礼制含义（《考古》8期），以及裴书研、陈昱浩对楚系青铜器发展的社会背景及特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期〕的探讨，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张闻捷系统归纳了楚国青铜礼器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并比较分析了楚地与中原、关中、齐鲁等地在礼器制度方面的异同（《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南方文物》4期）。郎剑锋介绍和分析了域外文献中著录的吴越风格青铜器，并作了初步的年代判断（《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7期）。吴小平对云贵地区出土战国秦汉时期青铜炊具所反映的文化因素作了颇为细致的分析（《考古》3期）。杨远《透物见人——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在对夏商周青铜容器分期、分类的基础上，论述了不同时期青铜容器的造型、装饰设计、装饰工艺的发展变化及其所体现的审美思想的演变。张昌平分析了商周之际腹壁伸出有长梁的青铜器容器，认为这是自妇好墓之后浮雕及复杂装饰发展到极致的一种体现（《南方文物》2期）。

青铜器的科技检测、冶铸技术及工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张宏英等人对郑韩故城出土东周青铜器的微量元素进行检测，发现21个青铜器样品的微量元素特征具有相对一致性，表明它们可能具有相同的原料来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技》4期）。邵安定等人检测分析了甘肃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的部分金属器，并讨论了金属器的制作技术（《文物》10期）。郁永彬等人对安徽枞阳汤家墩和铜陵师姑墩遗址出土冶铸遗物的检测分析，首次确认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砷铜冶炼活动，并发现枞阳地区在西周时期已开始使用冰铜冶炼工艺，是我国使用硫化矿冶炼冰铜最早的证据之一（《考古》5期）。李晓岑等人检测分析了云南洱源北山土坑墓出土东周时期铜器，发现其材质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多数器物为铸造，个别铜器还出现了表面镀锡技术（《江汉考古》3期）。周卫荣、黄维对先秦透空青铜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刘彦琪等人对甘肃礼县出土两件春秋青铜方壶（《文物》1期）、廉明琪对赵卿墓出土镬鼎（《文物世界》3期）分别做了制作工艺研究，取得了新的认识。

还有的研究涉及域外冶金技术。陈建立对中西方早期冶金技术作了系统的比较，在此

基础上提出，中国早期冶金技术传统是西方冶金技术传入并与本土创造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文物报》1月9日），中国早期冶铸技术具有传承与发展的特质，经历了“引进—吸收—再创造—反馈”的发展历程（《中国文物报》1月23日）。桑栎梳理了近东地区早期铜器的发现及冶金术的发展脉络（《边疆考古研究》17辑）。白云翔通过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出土铜剑的研究发现，这应是战国中期东渡朝鲜半岛的吴越地区铸剑工匠在当地铸造完成的（《文物》8期）。

### 玉石陶瓷器研究

玉石器与原始瓷器研究愈益引人注目。

叶舒宽、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一书编录有一组专研“玉兵”的论文。许宏指出，从玉兵的演变态势看，二里头时期部分青铜礼兵器已替代既有的玉兵器器种，从而形成“金玉共振”的局面。李健民认为，由殷墟妇好墓、广汉三星堆与新干大洋洲出土玉石仪仗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殷商时期中原与周边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已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王方强调，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兵器，是与青铜礼器、金器、象牙一起被埋的，显非实用之器，而是用于祭祀礼仪。

还有对玉石容器、礼器与配饰的研究。田小娟分析发现，商周玉石容器在器型与纹饰上多仿青铜礼器，也有仿陶器者。商代的玉石器皿多见于殷墟，以实用器为主，西周则主要见于周原地区，均为把玩的小器皿而非实用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7期）。越南北部出土的8件牙璋，年代为距今3600~3500年。彭长林认为这是冯原文化模仿三星堆文化牙璋的作品，是当地精英阶层彰显身份和地位的威信品（《华夏考古》1期）。张睿祥、欧秀花等人依据组合方式将两周组玉佩分为多璜式、玉牌式和环佩组合式三种，强调多璜式组玉佩主要出土于姬姓诸侯及夫人墓葬，玉牌式组玉佩专属诸侯夫人佩戴，主要起装饰作用（《中原文物》5期）。井中伟、魏凯分析了商周时期扳指的发展演变、功用、定名等问题，指出该类器物本名应为“夫”（《边疆考古研究》18辑）。张绪球对荆州院墙湾一号楚墓和秦家山二号楚墓出土部分玉器的制作年代、文化属性等问题做了初步探讨（《江汉考古》1期）。此外，张登毅、李延祥对山西出土先秦绿松石制品（《华夏考古》4期）、韩金秋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石锤斧（《草原文物》1期），分别做了类型、年代及功用等方面的研究。

针对玉石器及料器开展的科技检测、微痕分析与模拟实验研究，已占一定比重。幸晓峰、沈博对成组玉石璧的音乐性能和功能（《方国文明》），鲍怡、朱勤文等人对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2梁姬墓出土玉器的材质（《中原文物》1期），分别做了检测分析。叶晓红、刘新等人对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中出土玉器阴刻技术进行微痕分析，发现添加解玉砂的旋转砣具技术至迟于春秋晚期已被成熟运用于玉器阴刻（《南方文物》4期）。刘凌云通过模拟实验，证明西周玉器的斜刀技法是由硬物手刻完成的，而非斜砣琢磨所致（《南方文物》4期）。刘莉、陈星灿等人以浙江昆山遗址的两件商代三角形石刀为考察对象，通过模拟实验和微痕比较，发现此类三角形石刀很可能是用来切断植物茎叶的铡刀（《东南文化》2期）。付琳等人对林西井沟子西区墓地出土的一类外观呈黑、灰、白、淡黄色小型圆柱状“料珠”的成分及制作工艺进行检测分析，发现其原料主要为滑石（《边疆考古研究》18辑）。王颖竹等人检测分析了陇东征集的两件战国时期乳钉纹管形器（MB11、MB26），发现二者均有玻璃相和肉眼可见的石英颗粒。其中MB11是介于费昂斯和玻璃制



品之间的过渡制品（《中原文物》6期）。

近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围绕瓷器起源课题在浙江北部的东苕溪流域开展了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5年度不仅刊布了田野考古工作报告——《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文物出版社），而且编辑出版了《原始瓷起源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和郑建明的《夏商原始瓷略论稿》（文物出版社）。论文集汇集了“瓷之源”课题组成员的相关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原始瓷起源的考古学研究、原始瓷的物理与化学检测分析、实验考古、地质环境分析等方面。课题组一致认为，原始瓷应起源于夏代，成熟于商代早期，东苕溪流域是其最重要的起源地。郑建明的专著则全面考察了夏商原始瓷的分期、起源、技术工艺、社会含义，以及原始瓷与印纹硬陶、青铜器等器类的关系。以上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对原始瓷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但李宝宗、袁瑕（《中原文物》4期）、李清临（《华夏考古》4期）等人仍然坚持原始瓷起源的多源说。前文甚至认为北方原始瓷的产生要早于南方。温星金将北赵晋侯墓地出土原始瓷与中原都邑地区出土原始瓷器做了系统比较，认为二者共性较多，而与南方同期原始瓷在诸多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推测晋国早期原始瓷当源自王朝的赏赐或交流（《中原文物》4期）。

此外，方辉探讨了商周时期夷式簋的年代、来源及传播情况，认为夷式簋源于岳石文化的陶簋（《方国文明》）。石从枝考察了邢台商代陶窑的形制演变及陶器生产情况（《方国文明》）。

### 其他研究

郭明分别归纳分析了夏商周时期大型院落建筑的布局（《考古》3期）、形制（《考古与文物》5期）与大型单体建筑（《文物》8期）的发展演变，指出商周之际大型建筑存在三方面显著变化：与夏商大型院落建筑布局相比，西周出现了真正的对称式院落；商代大型院落流行“堂庑一体式”，周代大型建筑流行“堂厢分离式”；夏商与周代在大型单体建筑的整体风格和细部特征上有较大差异。张国硕、缪小荣系统考察了先秦城址的马面防御设施，认为其应源于我国北方地区，大体经历了萌芽期（仰韶晚期）、形成期（龙山时期）、缓慢发展期（夏商西周时期）与繁荣期（东周时期）的发展历程（《中原文化研究》1期）。

吴爱琴系统分析了先秦服饰制度的形成过程、特点及意义，认为西周时期表现礼制内容的冕服及配饰在使用上的差异已初步形成；战国时期，服饰使用进一步等级化、严格化，服饰制度基本形成（《先秦服饰制度形成研究》，科学出版社；《华夏考古》2期；《中原文物》3期）。

王志浩等人检测分析了鄂尔多斯北方青铜文化中的金银器（《草原考古》1期）。